

不同宪政秩序下的转轨路径与转轨绩效

——“北京共识”的内涵与应用

关晓光,汪毅霖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文章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文章设计了一个公共选择模型以解释各国间转轨效益的差异。转轨的成本不仅取决于经济考虑,更取决于政治的因素。政治选择影响新制度安排的效率,因此与转轨成本正相关。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这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关键词:北京共识;转轨;宪政秩序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6)01-0094-10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其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实际上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失败。本文尝试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与“苏东”的比较,回顾中国在转轨过程中选择宪政平滑式转变模式的原因,并对未来转轨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做出展望。

一、中国转轨路径选择的政治合理性

“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1]中国和东欧与前苏联国家在决定进行经济转轨时国情的最大不同是:

收稿日期:2005-10-08

作者简介:关晓光(1953—),男,黑龙江桦南县人,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汪毅霖(1981—),男,辽宁大连市人,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

中国在起点上拥有很好的既有宪政秩序^①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政治基础，政府仍掌握着改革的主动权；而“苏东”的转轨则发生在人民已对政府陷入彻底失望的情况下，既有的宪政秩序在反对派压力、群众抗议甚至军事斗争的摧毁下已名存实亡，政府对转轨的进程已失去了操控力。

基于此，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科尔奈等人认为应该将经济体制的转变和更大范围内整个社会基本制度的变迁区分开，主张政治变革才是转轨的核心因素。科尔奈将一个社会制度分为基础性特征和非基础性特征两个层面。认为转型的历史过程的结束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被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制度所取代，即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层面发生了改变(Kornai, Janos, 2000)。[2] 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在《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中指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认为真正完成了转轨的历史进程。并认为，经济转轨双轨制阻碍了宪政转轨，将产生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J Sacks, Wing Thye Woo, Xiaokai Yang, 2000)。[3]

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科尔奈等人将经济转轨与社会改革相区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这种划分可以更好地认清各国转轨时的社会基本矛盾和考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与制衡机制。但是他们把与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宪政秩序视为转轨的惟一方向，没有认识到源于“路径依赖”性，各国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经济状况是不同的，对何谓善治政府的认识也是不同的，虽然“有较好和较坏的政治制度，但没有一种政治制度会实现所有的普遍价值”（因为任何关于冲突的解决方案都不可能令所有人满意）（约翰·格雷，2002），自由主义不是政治领域惟一的善。

因此，各国政府在转轨中所应起的作用自然不同。按照“北京共识”的观点判断，宪政秩序应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发生转变，原有的政治体制在宪政变迁中应扮演何种角色，都是需要结合各国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问题（吕炜，2005）。

“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主要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线”（科尔奈，2003）。转轨的初衷是迫于经济增长的需要，但一直到1999年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CIS)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2000）。苏东国家大多是在短期内实现了市场化的改革，按照古典的经济理论，这种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高效的。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是，“苏东”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远远落后于中国，而中国同时期采取的却是双轨制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这说明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并不天然地与经济绩效成正比，“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的增长速率”（道格拉斯·C·诺斯，2002）。

关于科斯定理的更宏观的解释是：如果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交易成本都等

于0,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受政府类型的影响。但是,如果存在正的交易成本,那么一国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制定规则的制度结构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政治博弈过程中,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本收益状况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个人是根据他们所受到的约束,为追求效用的极大化而行动的。在与转轨相关的政治行动中,政治参与者自身的收益和损失之比对他们来说才是更重要的。因此,实际上是政治因素决定了转轨的路径选择,并直接影响了转轨成本;而并非从经济因素角度选择可以使转轨成本最小化的转轨路径。

在东欧和前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中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形成了利益分割集团,政治成本全部转嫁到了普通民众身上;同时,东欧各国地下政治团体长期比较活跃,民主进程有长足发展。所以可将转轨中决定政治走向的人群分为两部分,政治上倾向在计划经济中分享政治利益的旧社会精英的力量(R)和政治上倾向普通百姓的力量(P)。假设改革的参与者们是风险中性的,且转轨本身已经无法避免,在政治上需要决定的仅是方式和时间的问题。所有个人从所面对的改革中获益的概率均为 p ,较之初始状态的可比收益为 $g>0$,从改革中受损的概率为 $1-p$,较之初始状态的可比损失为 $l<0$ 。在总体足够大时,由于大数定理的作用, p 也是改革的获益者的百分比。假定维持现状的收益为0,若对先期改革不满恢复初始状态的成本为 $\&$ 。假定 $l<-\&$,因此失败者总是愿意使改革逆转。

(1)当转轨决策取决于在计划经济中分享政治利益的旧社会精英的力量(R),即 $R/P \rightarrow +\infty$ 时(情形1)。

由于在手中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政治上倾向在计划经济中分享政治利益的旧社会精英的力量(R)会在转轨中提前保证自身的收益,针对个人的转轨结果,即何者可能受益很大程度上是确定的,政治上倾向R的力量代表者们肯定在 p 的份额中。此时,如果 $p<1/2$,即使同时满足 $pg+(1-p)l>0$ 和 $\&<pg+(1-p)l$,即改革的结果将会比维持现状收益为0时好,由于政治上倾向于资本的力量控制了转轨的主导权,改革也不会发生,因为这更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如果 $p>1/2$,即使 $pg+(1-p)l<0$,只要 $\&<g$ (当R集团失去政治垄断权时,P集团有可能采用追讨手段,使改革发生相对于R集团来说的逆转),他们就会借助国家的力量强制推动改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转轨本身的新制度实施成本会趋向于最大化。俄罗斯的寡头私有化就对应于这一情形。

(2)当转轨决策取决于政治上倾向普通百姓的力量(P),即 $R/P \rightarrow 0$ 时(情形2)。

由于人数太多,不可能保证所有人都会在改革中受益。改革结果在一个

阶段完成前仅是可预期的,不确定性纯粹是针对个人的,即何者可以受益是不确定的。如果 $p < 1/2$, 人们总是愿意事后逆转。此时,即使 $pg + (1-p)l > 0$, 即改革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益的,只要逆转成本高于预期收益,即只要 $\delta > pg + (1-p)l$, 改革的结果将会比维持现状收益为 0 时差,将会产生反对改革的现状偏好,失去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 $pg + (1-p)l > 0$ 和 $p > 1/2$ 同时成立,转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转轨将会有极大的交易(谈判)成本。此时,公共资产的绝对的平均分配可能成为政治上惟一可行的选择(因为这增加了使 $p > 1/2$ 的可能性),这导致了产权的严重分散化,为以后的公司治理带来了难题。捷克的国有资产无偿证券化平均分配给全体公民的做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3)当倾向二者(R和P)的政治力量对转轨决策的影响力趋于或近似于平衡,即 $R/P \rightarrow 1$ 时(情形3)。

首先这种情形在宪政断裂式转轨的国家中不可能发生,因为宪政断裂或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或是源于社会上其他政治竞争集团的压力,在转轨的政治选择开始前已经形成了一方控制政治决策权的局面,转轨路径陷入情形1或情形2中是路径锁定的。而对于宪政平滑转轨的国家,情形3成立的条件可以近似地等价于存在超越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利益的中央决策者。此时,转轨的结果更可能是产生良性的市场秩序并减少转轨成本,即阻止寡头对社会资源的非正义侵占,也有利于达成民主环境下推动改革的必要条件,即当 $pg + (1-p)l > 0$ 时, $p > 1/2$ (p 在这种条件下趋近于1,因为有公信力的政府可以承诺对改革受损者进行事后补偿)。转轨后出现有效率的帕累托制度均衡^②的概率变大,因为此时政治领域的科斯定理有了成立的基本条件,即政治家和强有力的社会团体可以与社会中的其他团体达成协议,使前者放弃对无效率的现有制度的控制,允许他人选择可以促进生产力提高的政策和制度,然后向前者再分配一部分收益。这需要像中国一样有强有力的并且在转轨中能始终保持其权威的政府保证承诺的公信力。^③

由此可见,中国在转轨绩效上的良好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在政治体制处理问题上的优势。中国在政治体制问题上能采取较之“苏东”更加灵活稳健的处理方式是有“苏东”所不具备的三个前提条件的。

一是中国在政治上较“苏东”有比较浓的地方分权色彩,地方上长期存在着“计划外”经济,^④与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经济体交流的需要也使得政治上必须对经济问题持一种较为灵活的态度。二是中国在转轨前所有人的利益都处于一种负向帕累托演变的状态,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在转轨初期对改革的要求只是要尽快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相对于苏联这样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基础还不稳固,中国首要面对的是经典的发展问题,而“苏东”首要面对的则是转轨的工业结构调整问题。所以,中国可以进行代价较小的增量调

整,而“苏东”只能首先进行代价较大的存量调整。因此,在经济景气持续好转的情况下,对政治既得利益的“赎买”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和对经济的扭曲是较小的,使这种政策可以以低成本来执行。三是中国与“苏东”虽然同是计划经济,但制度起点却不同,苏联和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则是排斥理性的、长官意志和政治挂帅的命令经济,因此,计划经济低效性的表现是不同的。所以中国的转轨,一开始就是从混乱中走出来,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理性计划都可以增进效率,而不必立即承受转轨的代价。

令政治既得利益集团和普通百姓对改革的偏好一致,减轻其在转轨中对经济制度的影响。这种解决政治问题的方式在经济上体现为双轨制,即在保留原有的计划经济的同时外在地引入市场经济,保证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改革的普通参与者可以在转轨中都受益。这就可以把政治问题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逐渐化解,不会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这可能是中国与苏东国家在转轨绩效上存在差异的一方面原因。

二、转轨路径的政治选择对转轨绩效的影响

诺斯的研究表明,交易成本是影响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不同制度模式下的交易成本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法制严明,产权清晰的制度条件下,政府的政策是支持生产的,所以社会的单位交易成本较小,人们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通过“干中学”的过程实现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因此,制度的效率实际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知识技术的积累速度,进而决定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实际上,转轨本身也是一个与相关制度安排和整个制度环境不断适应、不断发展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证,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转轨的顺利进行必须要满足一系列政治约束条件,政治博弈结果有时会反映在转轨后经济体制的性质上,进而对经济绩效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必然牵涉到利益关系的改变。转轨涉及到原有的社会公共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划分。在转轨过程中,若缺乏有效的政治制约,对应于前文中的情形 1,社会中 R 人群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努力攫取更多的初始资源。反之,新政府如果倾向于满足 P 人群的偏好,对应于前文中的情形 2,政治选择的惟一结果就是公共资产的绝对平均分配和对计划经济中的既得利益的全部重新划分。

产权在起点上的分配实际上决定了转轨中的制度安排所可能具有的效率,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下,转轨中的制度安排往往不是源自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而是源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垄断。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化的产权分配可能会引发“无竞争的伪自由”,这种分配所伴随的是寡头集团对经济的垄断和

大量资本的外逃,将产生最低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使转轨实施(交易)成本极大化,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会在短期内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陷入到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东欧部分国家较好的转轨绩效^⑥(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也并不等于它们的产权安排就毫无问题,它们实际上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负增长。波兰、捷克等国的经济难题在于过于分散的产权结构(不论是分散于内部工人还是全民)所造成的企业重组和治理的困境。初始的财富分配会造成转轨的新制度安排在效率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短期和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绩效(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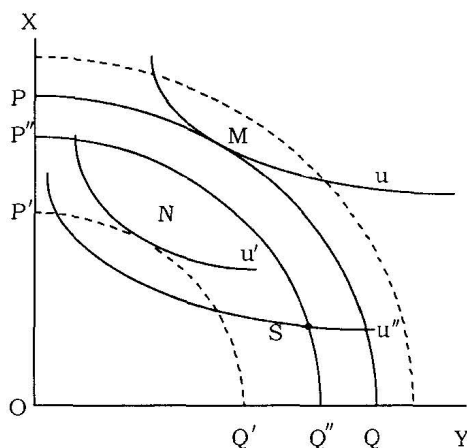


图1 转轨起点上的产权分配
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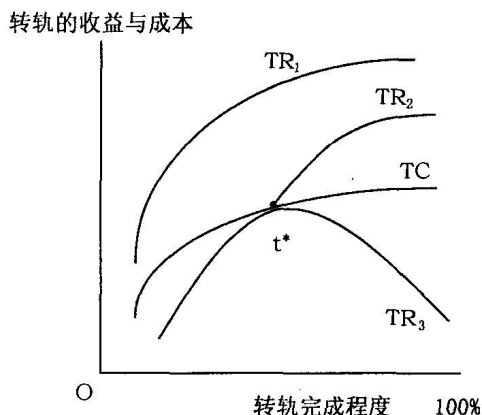


图2 转轨效益与转轨目标实现
过程中的不同路径

假定社会生产两种产品 X(其他消费品)和 Y(重工业产品),转轨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短期内不变,在长期可能因为新制度效率不同而发生内生的变化,消费者偏好不变。曲线 PQ 是转轨起点期的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边界的斜率是放弃 X 生产 Y 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产品转换曲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者是虚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的特点是官僚利益本位(满足政府的非经济性效用要求)和计划刚性(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能力和动力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企业独立改善生产结构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收益)。假定 S 点代表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偏好的生产结构,由于经过结构性生产可能性边界上 S 点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 u'' 低于曲线 u ,所以 S 点显然代表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而这又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所以结构性边界内陷于技术性边界和“苏东”等国的经济增长在转轨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可能获益的交易无法进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

此时的社会生产函数是:

$$Y=f(K,L,A,\dots)e^{-u} \quad (u \geq 0)$$

其中: Y 为实际产出量, $f(K,L,A,\dots)$ 为技术边界生产函数, K,L,A,\dots 分别为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 $0 \leq e^{-u} \leq 1$ 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产无效率, 结构性的实际产出量总是在 $f(K,L,A,\dots)$ 曲线的下方。

转轨的短期经济目的是通过改革产权结构, 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通过引入竞争优化生产结构, 使社会总产量由 S 增长到 M , 此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曲线在 M 点相切, 边际产品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 社会生产实现帕累托最优, 即实现转轨的水平效应。转轨的长期目的是基于: 合理的转轨制度变迁会带来转轨效益(租金), 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促进社会知识存量 and 资源禀赋的积累, 使技术生产可能性曲线沿 PQ 外移(如图中虚线所示), 即实现转轨的增长效应。

但是, 转轨目标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的合作(见图 2)。

以 TC° 表示转轨总成本曲线, TR_1, TR_2, TR_3 表示制度效率差异所导致的转轨经济发展的三条不同的路径, 转轨效益 = 转轨收益 - 转轨成本。由于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在政治体制处理问题上的优势, 中国的转轨选择一条增量积累的方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 即可以保证转轨收益在转轨期间始终大于转轨成本。在图 2 中对应于由 TR_1 表示的经济发展路径。对于“苏东”等国, 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存在大量比较劣势产业的现实决定了其在经济上只能先进行存量改革, 此时政治选择的不同所引发的制度安排的差异会把转轨经济引入两条相反的发展路径。“苏东”各国的生产水平短期内都会退化到图 1 中 N 点的水平, 问题是生产由 S 退化到 N 的原因不同, 部分转轨国家是因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无效的结构性边界 $P'Q'$, 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 $f(K,L,A,\dots)$ 不变, 而 u 变大, 即 e^{-u} 变小, 长期看会内生地降低技术性边界 $f(K,L,A,\dots)$; 部分国家是由于短期内转轨中制度变迁成本大于收益, 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 在适应过程结束后可容易地达到 M 点, 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 $f(K,L,A,\dots)$ 不变, 而 u 先变大后变小, 即 e^{-u} 先变小后变大, 在长期, 制度效率的改善会引发技术性边界 $f(K,L,A,\dots)$ 内生地提高。 t^* 为转轨效率分界点, 渡过 t^* 点后, 步入 TR_2 路径的国家的转轨效益会逐步扩大, 陷入 TR_3 路径的国家则可能长期承受转轨带给经济的负效益。

所以, 判断一个国家在转轨中适合采用何种宪政变迁方式, 关键要看从本国实际出发能以何种方式化解政治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利影响, 使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挥积极的作用, 合理的宪政秩序意味着政治权力应维护一个能双赢解决问题的制度框架。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的转轨没有经历“苏东”一样的阵痛期, 既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又稳步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 效率高于捷克、波兰等国, 而它们又好于俄罗斯, 因为它们毕竟建立起了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制框架,^⑤ 经济代价也没有像俄罗斯那么大。

转轨中的宪政断裂式变迁所造成的国家短期机会主义行为(转轨路径政治选择中情形1的结果)或个人理性引起的集体非理性(转轨路径政治选择中情形2的结果),可能会大大影响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和发展绩效,转轨效率不如宪政平滑式的变迁。这一结论证明了中国宪政平滑式变迁能在短期内减少转轨中的制度创新成本,并以此减少单位交易成本和使社会整体交易成本合理化。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北京共识”所阐述的各国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转轨道路的理论的合理性。

综上所述,转轨中的制度变迁的目的就是要减小单位交易成本,合理化社会总交易成本,如果转轨本身会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那么至少这在短期内肯定是不合意的。在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双轨制和隐性赎买是化解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转轨交易成本的有效方式,而这种转轨过程中的中庸型制度安排本身既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政秩序,也为宪政秩序的平滑转变创造了时空条件。

三、总 结

中国的宪政平滑式变迁的转轨模式的有效性已经被实践所证实。但是,中国的转轨还远未完成,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多是些核心性的问题,如产权、利益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所以,未来的改革将会是一个在边际上加速制度创新的过程。

1. 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分为财产的处置权和财产所带来的收益的享用权,产权的清晰和对产权的严格保护是有效制度的基础。中国在计划经济中一方面多部门共享国有企业的产权,造成九龙治水的局面,实际上只能是三个和尚没水喝;另一方面则是对私人和集体的财产缺乏保护,私有企业享受不到和国有企业一样的平等待遇,农村集体土地经常被以行政手段无偿或低偿征用。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激励。

2. 进一步放开市场。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仍是消费品的自由流动,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流动仍受到很大限制,影响了市场资源配置效能的发挥。这种不完整的市场经济与兰格所说的社会市场经济非常相似。调控的基础是充分和真实的信息,然而竞争和信息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没有竞争性的激励作为前提,很难保证调控者能从厂商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那里得到充分和真实的信息;并且把中央调控者看成是整体取向、公共利益和纯粹理性的化身,其假设本身就是需要考虑的。

3. 加速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建设。在我国近年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集体受益性质已经基本成为了历史(胡鞍钢、王绍光,2000)。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维持在0.45左右(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0.40),高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已成为转轨国家中贫富差距较大者。利益的协调是维护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必

须进一步改进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4. 调整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宪政秩序的改善。由上述可知,宪政的平滑式变迁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中国转轨的制度成本,但这实际上是把困难后推,该解决的问题总是需要解决的。必须抓住中国市民社会开始觉醒、力量不断增长的有利契机,加快政府职能的改革,使政府由管制型转变为服务型,避免政治利益集团的机会主义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逐步从根本上解决转轨中政治领域的交易成本问题。

注释:

- ①这里的宪政秩序,并不是法学意义上的宪法,而是由整个体制结构所决定,并反作用于全部制度安排的根本性秩序,它的主要载体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决定着处于其中的人们的基本行为方式,这类似于宪法在法学体系中的作用。
- ②制度的帕累托均衡与微观上的帕累托均衡概念是不同的,制度的帕累托均衡是指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1)已经获取了各种要素资源所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2)潜在利润仍然存在,但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潜在利润;再或者,(3)如果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现存的制度结构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是帕累托制度均衡。参见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第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③实际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和“在改革初期先发展东部地区,当前又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战略”的改革顺序的选择都是政府承诺公信力的体现。
- ④在改革前的1977年,仅“计划外”经济中的社队工业总产值就达到322.6亿元(以1970年不变价计算),1980年,社队工业产值已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6%。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
- ⑤东欧在转轨中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比较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正式文本的宪政约束,所以宪政断裂式变迁的成本不是很大,捷克和波兰1996年的GDP分别为1989年的94.8%和104.6%,基尼系数同年分别仅为0.26和0.29。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98):Economics of transition[R]. VOL6(1),PP. 251。
- ⑥由于本图只是一个定性说明,而不涉及精确的定量问题,所以出于讨论的方便,本文在此处不考虑各国间转轨成本在量上的差异,这种设定不会妨碍本文说明的逻辑严密程度。但实际上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转轨成本是要小于“苏东”国家的。
- ⑦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筋疲力尽”。这不仅是对激进改革的否定,而且也表明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民主,而是政治上的混乱。1993年宪法赋予了总统职位超常的权力,令总统可以轻易解散议会和罢免政府总理。另外,普京所谓的激进改革所带来的政治动荡,主要是指寡头政治和地方政治与中央权力的分离。因此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一直与“宪政”的混乱相伴。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二卷,32~33.

- [2] Kornai, Janos.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Winter 2000, 1(1): 22~27.
- [3] J Sacks, Wing Thye Woo,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J]. *CID Working Paper*, 2000, 42(4): 50~60.
- [4] 约翰·格雷.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9.
- [5] 吕炜. 基于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分析方法研究——兼作对“北京共识”合理逻辑的一种解释[J]. *经济研究*, 2005, (2): 17.
- [6] 科尔奈. 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21.
- [7] 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0: 5.
- [8] 道格拉斯·C. 诺斯. 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9.
- [9]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R]. EBRD, 1998, 6(1): 251.
- [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选自胡鞍钢, 王绍光. 政府与市场)[C]. 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0: 253.

Transition Way and Transition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Content and Application of “Beijing Consensus”

GUAN Xiao-guang, WANG Yi-l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quite important for transitional countries to choose transition way to achieve a good transition efficiency and work out the develop mode after the analysis of “Beijing Consensus”. We set up a public choice model to explain the transitional efficiency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find that the transitional cost i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economic factors, but also by political factors. Political choice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new system arrangement and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transitional cost. On its way to transition, China chooses smooth change in the constitution, which could solve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economic cost and political cost in the short term.

Key words: Beijing Consensus; transition; constitutional order

(责任编辑 许 柏)